

I 机遇的得失与民族的兴衰

1 旧中国近四百年间一再丧失发展机遇的历史沉思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各族人民以勤劳勇敢聪慧著称,世世代代创造着自己祖国的灿烂文化。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 16 世纪前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生产力的发展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天文学、数学、医学、植物学、文学和军事学等学科,在战国以前都已有所成就。战国时代(公元前 3 世纪左右)已有‘磁石造铁’之说,东汉时(105 年)已知磁石的指极性。造纸法也是东汉时发明的。印刷术创始于隋朝(600 年左右),宋时(1041 年至 1048 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11 世纪已开始应用火药。养蚕、丝织、种稻、植棉和炼钢、制瓷、建筑、水利等技术,早就闻名于世。由于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使中国远在秦汉时代就进入农业经济发达的社会,历经晋、隋、唐、宋、元各代而不衰。我国中古时期(甚至包括更早以前)形成的科学文化高峰,标志着世界首次生产力发展的高潮。但是,中国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过去之后,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的停滞因素就日渐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生产力发展高潮,出现了工业发达社会。一两个世纪前,美、日等国也比肩而上。一反一正,相较之下,中国下来了,西方上去了。从明末直到我国解放前的几个世纪里,诸多的因素,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发展的机遇。历史事实说

明,在生产力发展高潮的重要关头,痛失机遇的后果不堪设想。

在世界第二次生产力发展高潮时期的失机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我国明末到清朝道光年间,正是欧洲一些国家生产力蓬勃发展、处于世界第二次生产力发展高潮时期。继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早在 16 世纪末,德、意等国或为内战所扰、或为分裂所忧而无暇顾及英伦三岛的时候,给了英国优先发展的机会。英国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两件武器,一件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实行生产的专业化、协作化和产品的社会化;另一件是大机器生产。当蒸汽机驱动大机器运转起来的时候,就整个地改变了它的社会。后来,欧洲大陆和美、日等国都相继推广蒸气机,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变了。

而当时的中国呢?开始比之于欧洲的先进国家,起步还不算晚。中国的手工业已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江南一些城市出现了“道上车千乘”的繁华景象。代表市民阶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李贽、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萌发了民主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家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写下了《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样的巨著。西方传教士出于他们的需要,也曾把欧洲刚刚兴起的近代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带进中国,一批介绍西方科技的著作随之编译。但是中国终于没能参与世界上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当然也没有出现根本转折。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比西方封建主义的根基要深厚、顽固得多。明朝统治者对工商业的重压,清朝统治者对手工业城市的摧残,加之汪洋大海般自然经济以及抑商主义的包围和夹击,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能够生长起来。当时中国实已闭关锁国。尽管中国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不久明朝皇帝即下令禁止建船出洋。明王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付北方的威胁,因而它

更倚重修复长城及于沿线设置重兵，至于防止海寇，它以为只要有森严的海禁就行了。事实上，明王朝仅下令禁止通商，并未部署海疆防务。郑和的大船搁置了，海上的贸易锐减了，与海外交际被看作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以后日本海寇一再袭击我国沿海，朝廷也只重地面防御，没有考虑也无力加强海上力量，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辽阔的海疆。清朝康熙乾隆年代对防御外敌入侵和进一步统一中国是有贡献的。但总的说清朝历代的闭关锁国一点也不亚于明朝。在欧洲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时候，清王朝还蒙在鼓里。直至西方用近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轰开锁国之门，昏昏然的清政府惊惶失措，一筹莫展，竟然连怎么挨打的都糊里糊涂，甚至以为只要屈膝让步、割地赔款就能摆脱危机。西方侵略者的炮火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使他们深感需要学习西方以救危局。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也爆发了。但中国已经错过了一次发展自己的极为重要和宝贵的机遇。

在世界第三次生产力发展高潮时期的失机

18 世纪末叶起,德国当着英国忙于产业革命、法国忙于政治革命的时候,开始了哲学革命,接着掀起化工技术革命,宣告了世界第三次生产力发展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期,即中国清朝咸丰至宣统年间。这次高潮前夕,中国和日本的情形颇为相似,也大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当时,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强迫日本开港,使其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日本统治集团中的尊攘派伊藤博文等人在考察了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中国后,强烈的反差使他意识到尊王必须倒幕,攘夷必须开港,发展了倒幕开港运动。1868 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完成了倒幕(夺取封建政权)的任务。明治政权提出了文明开放、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它以西方国家为榜样,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改革,竭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1871 年,新政府

不到 3 岁,除必要留守人员外,政府要员倾巢出动前往欧美考察,历时 22 个月,可见其图强之决心。种种内外条件,使日本跟上了世界发展行列,实现了工业化。它不仅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跃为东方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人称其为‘脱亚入欧’。

而中国呢?19 世纪 30 年代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面对当时‘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灭’的封建统治,鼓吹改革现状,要求废科举、禁鸦片、造机器、建海防,并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目的则在于‘制夷’。这个时候,我国已开始逐步产生近代工业的雏形。19 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些民族新型小企业。60 年代洋务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办了数百个企业,引进了西方的设备、技术和一些管理办法,训练了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举办西学,教授外语和自然科学,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沉闷的学术空气有所改变。但是,中国从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决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掠夺中国以扩展它自己的利益和势力。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当然也决不会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给自己送葬。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在这个根本点是完全一致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变革和进步的要求,加之革新力量(何况有的还很难称上革新力量)本身的微小和软弱,使我国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谋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拿洋务派而论,在‘师夷’这点上它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但它屈服于帝国主义,与反抗外国侵略的林则徐却不相同。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操纵洋务以‘师夷’的算盘,不是打在‘制夷’上,而是打在‘制内’即扑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火焰上。这就注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汇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覆没,宣告了洋务派的破产。

此后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维新派,其代表人物的牺牲精神是感人的,但维新派推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路线,它既在国内政

治上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场，也在如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抱着改良主义的幻想“百日维新”；实际上是比百日只多了 3 天，便淹没在血泊之中了。谭嗣同在横刀之时喊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壮之声，其意味是深长的。这段历史，在中日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发展的道路，但它也同时加入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列。而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发展的机遇，中国没有能够走上资本主义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当然也不可能摆脱民族危机，依然处于任人宰割的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

在世界第四次生产力发展高潮时期的失机

在我国清末到中华民国这段时间，以美国为中心兴起了电力技术革命，这是世界历史上第四次生产力发展高潮时期。

19 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怒潮的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于 1905 年宣布废除科举，并将书院改为学堂。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已拥有大学 120 余所，中学 800 多所。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也较多地吹进中国大地。1911 年，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带来了转机的希望。如果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能够实现，我国也就可以早一些走上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道路了，这或许有利于逐步跟踪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潮流。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辛亥革命曾经在下层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对此深感害怕的君主立宪派和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鲁迅在《阿 Q 正传》中刻画的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之类，他们在设法弄到一个装潢革命的“银桃子”以后，便对别人下令“不准革命”了。由此可见革命的阻力之大。尤其不幸的是，当时反动势力的头子袁世凯凭借手中的实力，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了胜利的果实。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产生预

想的独立和民主，也没有给科学和工业救国提供现实条件，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影响是巨大的。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趁帝国主义一时无暇东顾之际，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大战刚过，欧美列强旋即卷土重来，加紧控制中国，加之军阀混战不已，中国民族工业又丧失了发展条件。2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已经身受‘三座大山’（又加了一个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效劳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更无可能再有发展科技、发展工业，即发展生产力的机会。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人民一直处于灾难的深渊。解放前的旧中国，一次次失机，一次次掉队，比之处于第四次生产力发展高潮的西方经济强国，形成了二三个世纪至少也是一个多世纪的差距。作为旧中国终点的1949年，钢产量仅15.8万吨，煤产量仅3243万吨，粮食为11318万吨，棉花为44.4万吨；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连与印度比都差距很大，不足它的一半。发展生产力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使命，只有落在胜利后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肩上了。

2 新中国建立后发展机遇 得而复失的深刻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是美苏两国，大力发展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继而日本、欧洲等国也参与进来，掀起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命。当这场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候，信息革命又接踵而来。这个技术综合创新的高技术时代，即世界第五次生产力发展高潮，现在仍在不断蓬勃发展之中。它一开始就给各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个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新中国在面临帝国主义军事威胁及经济封锁、国民党残余势力捣乱破坏、战争尚未结束和民主改革有待彻底进行等等极为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下，不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且有效地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经，恢复了千疮万孔的国民经济，进而踏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1952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53年，我国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工作。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到1957年，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度地提前完成了。全国工业生产总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这个速度，名列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起飞阶段发展速度的前茅。这个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一百年的总和。全国农业生产总值达到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与此同时，科教文化也有重大发展，某些高技术正在起步。这样，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造成的我国与日本之间拉大了的差距又差不多拉平了。当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战败也走了一段低谷。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停滞与一再掉队之后，由于人民当家作主，选择了社会主义，第一次争得了发展机会。我国面前升起了逐步参与世界发展行列的曙光。

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到1966年，全国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比1956年增长3倍。建立了电子、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后来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我国经济建设骨干力量，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起来的。尤其是科学技术这一仗打得相当出色。突出的如自力更生研制成功

原子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的问世仅比先进国家晚了 3 年，我国已成为能够制造马赫—2 喷气式飞机的第五个国家，等等。但是 1957 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也使我国遭受了不少损失，耽误了不少时间。

在世界第五次生产力发展高潮中，造成我国历史性大耽误的是 1966 年 5 月开始的长达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它的灾难性的恶果是多方面的，在引起思想空前混乱、理想信念严重削弱、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构受到严重破坏、社会风气遭受严重毒害的同时，科技教育和国民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触目惊心的。大批著名的教授、专家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帽子挨批挨斗甚至被迫害致死，大量优秀的科学文化著作被诬为“封资修黑货”受到查禁甚至被毁灭，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的教学被长期中断，致使我国少培养了几百万青年人才，在科技队伍的结构上出现了 10 年以上空白。动乱摧残了科学文化，也严重破坏了生产。倘若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 年间国民收入的损失大约 5000 亿元——相当于建国后 30 年我国人民苦心经营积累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就这样给败掉了。林彪“四人帮”对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政策和措施，无不加“罪”讨伐，四个现代化被诬蔑为“资本主义化”，重视生产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知识”与“反动”同义，“学习”和“白专”并列，脱贫致富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引进技术装备成了“洋奴哲学”，按劳分配是“物质刺激”，加强管理是“管、卡、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给人们的心灵留下的创伤和阴影更为长久。它往往使人“怕”字当头，怕“学”——读书无用，学习世界先进的东西危险，怕“改”——把一切变革看作禁区，怕“干”——担心干工作、搞生产被抓住辫子；怕“富”——谈富色变，以贫为荣；归根结蒂是怕“资”——怕利用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的东西会导致资本主

义,甚至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每迈出一步都遇上姓‘社’还是姓‘资’这个要害问题。可以想见,生产力结构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人(至少是许多人)被戴上精神枷锁,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抓住机会、发展中国带来多大的危害!它比国民经济直接遭受破坏造成的损失更难以计算啊!在10年动乱中,只是由于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苦撑危局和邓小平同志复出那段时间狠抓全面整顿,在广大群众的艰苦努力下,才使工农业生产取得一定进展,某些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仍然获得成功。但它决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它只能说明,要是没有10年浩劫,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将是何等迅速!

正当我国关起门来实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之际,当时绝大多数国人一无所知的外部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电子技术革命刚入高峰,信息技术革命业已开始,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旋风几乎席卷全球,发达国家依赖高科技有了新的发展。日本的经济,有点像希腊神话中的“不死鸟”展翅腾空,一跃而为世界一流经济大国“四小龙”,其中包括中国香港、台湾,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跳跃上来的。10年浩劫,使我们在紧要时期丧失了宝贵的机会,结果我们本来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缩小了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1978年10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讲了这样一段话:“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①同一年,他在另一个场合论述生产技术水平的时候还讲到:“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2页。

距。”^①在世界如此迅速发展而竞争又如此激烈的当代，我们对发展和竞争中形成的“时间差”确实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很强的危机感，即使是原来不很大的差距对我们已经构成很有分量的压力，而 10 年动乱却使我们在人家居前争先恐后赛跑的时候摔了一个伤筋动骨的大跤，这难道还不危险吗？可怕的是，在极左思潮肆虐期间，对这种真正的危险连想都不能去想。

这次耽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造成的。我们对‘主义’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来自当时日益发展而占统治地位的“左”的思想对“主义”的扭曲，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取代了实事求是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解放、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贫穷的社会主义”取代了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僵化封闭窒息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生机，等等。由此可见“左”的危害之大。“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确有右的东西，但根深蒂固的是‘左’的东西。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且一次比一次为甚，几乎断送革命。建国之后没有很久，从反右派扩大化到反右倾，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粉碎‘四人帮’后，还搞了一段‘两个凡是’。尽管它在我们党的伟大历史中只是一部分现象，但其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危害之烈，确实令人久思。“左”和右的表现形式不同。右，是以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公开否定社会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它的现象和本质比较一致，较易识别。“左”就不同了，它是通过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顶峰化即以“凡是派”面貌来阉割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从而篡改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它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9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5 页。

也是通过把社会主义神圣化即以“歌颂派”的面貌来歪曲、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它那‘真理在握’的脸孔更能吓唬人,它那‘革命’的外衣更能欺骗人。“左”和右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它们都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特征,只不过各自处在两个不同的极端罢了。因此,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既反对唯书不唯实,也反对唯‘西’不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排除任何一种错误倾向,从世界观方法论上解决警惕右和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们党已经作了决议,早已从理论到实践上被彻底否定。它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从 1957 年开始的‘左’的思想,一直发展到 10 年浩劫,使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①同时,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②

3 新的道路使我们重新抓住机遇 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 1935 年党的遵义会议一样,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8 页。

② 同上书,第 266 页。

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永放光芒的会议。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飞跃,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革命从此转危为安,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飞跃,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转折,从此摆脱了 10 年动乱造成的困境,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我们重新抓住了机遇,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掀开了民族复兴的崭新一页。

这次伟大转折,最重要最鲜明的是从“两个凡是”转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僵化转到改革,从封闭转到开放。也就是从“左”的一套转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生命线。

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们党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直胜利地驾驭着东方这艘最大的航船向着世纪之交和 21 世纪进发。不论遇到什么惊涛骇浪,总是把发展作为硬道理,以全面振兴中华为目标,紧紧把握机遇,坚定地实行三步走的战略。

我们党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十分复杂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既纠正了“左”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可靠保证。

农村改革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花鼓之乡的安徽凤阳一个生产队开始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到 1983 年初就已风靡全国。经过不断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普遍实行。随着农村经济的日益商品化,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大大

超过全世界十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农村发生如此迅速深刻的社会变革,以致短短几年就摆脱了‘一大二公’的绳索,同时彻底改变了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为中国抓住机遇参与世界发展行列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发展的惊世之举。不论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经济调整,改革开放的海潮一直在中国大地涌动着。这是一个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和改革开放相互依存,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限度地推动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当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下发生政治风波的时候,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加大压力的时候,当一些人误以为需要改变航向的时候,我们航船的舵手不失时机地斩钉截铁地决定 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开天辟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经济的长远发展和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展示了新的前景。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使我们赢得了发展时间。

改革的深入,创建一个个经济特区的成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两个文明的协调,以法治国的加强,安定团结的维护,使我们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国内条件。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我们争得了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

为了谋求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向高科技进军 向贫穷宣战 向山河平川大显身手。浦东、洋浦开发了,几十个城市的地铁开始筹划了;‘当惊世界殊’的三峡工程启动了,贯穿南北的京九铁路完工了……

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没有先例

地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度降低物价涨幅又保持了年均 12.1%（按 1992 年至 1996 年计）的经济增长率，铺设了一条快速而又平稳的可持续发展轨道。1997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74772 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3251 亿美元，外汇储备增至 1399 亿美元。近几年尽管一再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仍然连创纪录，现粮食总产已达 4900 亿公斤以上。我国在实现了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后，提前实现了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步缩小。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上升到世界第七位。在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 9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居于首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近 5 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5.7%。我国的贫困人口也已由 70 年代末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一下降到世界的二十分之一。1997 年 9 月，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份材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作了这样的描绘：“自从 1978 年中国开始实施经济改革计划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9.3%，文盲率减少到人口的 10% 以下。中国的高期望寿命和低婴儿死亡率为众多富国羡慕不已。中国在改善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消费水平提高了一倍以上，贫困人口减少了 60%。”它发布的《2020 年的中国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预测中国经济在 21 世纪可以持续高速发展。

我们正在成功地实践“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洗去百年耻辱，民族精神为之大振。澳门归来已确定载入本世纪的历史。台湾问题也终将得到解决。

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后，我国继续稳定发展，显示了在维护亚洲繁荣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尽管我们在发展中出现过而且现在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这改革开放的 20 年，是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政通人

和、国泰民安、声望日高、扬眉吐气的 20 年,是显示社会主义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的 20 年。20 年的伟大成就,已经为我国跨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 年来的历史证明,作为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理论。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确保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社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唯一正确之路。一个正确理论和一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一系列正确政策的选择,是我们抓住机会、争取时间、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我们应当非常珍视这个根本条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在大发展的新起点上停顿,而只能在大发展的新起点上加劲。我们不会忘记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世界银行两年多以前发表的世界 192 个国家和地区人均财富排名表上,我国还是倒数第 30 多位。今后的路程更艰巨,工作更伟大,更需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4 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是很要紧的时期。 我们不再丢失机遇,中国才能真正腾飞起来

历史是一部教科书。

从旧中国以前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我们懂得了丧失机遇的严重后果。在那漫长的黑夜,腐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统治代表落后的生产力,不可能发现和利用机遇发展生产力。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只能眼看一次次丧失机遇而空留遗憾。中国长期落后掉队,带来的是数不尽的挨打、屈辱、苦难,致使濒临民族危机。

新中国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犹如枯木逢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转机,一派欣欣向荣。但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只能在探索中前进,特别是由于发生和发展了‘左’的错误,又使我们在世界蓬勃发展时期耽误了 20 年时间。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选择了新的路线政策使我国重新奋起。我们又获得机遇向前发展了,而且是一直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的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战略意义,结合历史细加体会,理解就深刻得多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更重要含义,是关注于中华民族从现实到未来的大发展。我们前面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回头看,本意也是为了向前看。我们应当取大视角(把中国放在全球中)、用望远镜(从世界前进的趋势上)来认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机遇,是发展的阶梯“欲穷千里目”,必须借助阶梯不断“更上一层楼”。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总揽全局,把握时势,立足现实,洞察未来,为我中华设计的宏伟蓝图是实现三步走的战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上升到 6 万亿美元,如以 15 亿人口计年人均均为 4000 美元。到那时,我国将跃居世界的前列。第一步是小发展,第二步是中发展,这第三步才是真正的大发展。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从 16 世纪以来第一次登上发展的高峰。到那时,我国将彻底抹去落后的阴影,以富强、民主、文明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到那时,我们就能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的成功,给人类带来最现实最有说服力的新曙光。

这是革命先辈的伟大理想。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就要胜利结束之际,毛泽东同志以其革命浪漫主义的手笔,写下了《念奴娇·昆仑》。此词用‘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开首,最后气势磅礴地展现了他的伟大抱负: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到下个世纪中叶,由于我国的大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展示,将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环球同此凉热”;已经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了。我们一定要赢得这个未来。我们也一定能够赢得这个未来。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可再失机遇。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同志以其 88 岁高龄巡视南方并且一再关注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一个重要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泽民同志十分强调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的一个重要缘由。抓住发展机遇,我们就能拥有 21 世纪;丢掉发展机遇,我们就有失去 21 世纪的危险。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民族的面前。“得时者昌,失时者亡。”我国战国时代列御寇留下的这条古训,至今还是有其思索价值的警句。

要说抓住机遇,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很好的机遇。不仅国内条件具备,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国家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最具吸引力的巨大市场和发展潜力,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而且国际形势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的主题,我们可以争取和利用较长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可以在世界多极化发展和国际各种矛盾中找到和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可以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现代科技进一步蓬勃发展中,学习和引进资金、先进科技成果和其他有益的东西壮大自己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进步潮流,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①。在有利的形势

^① 江泽民:《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载《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ii 页。